

数字社会学的缘起及发展 ——社会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吴 彬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 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 在细致梳理数字社会学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本文对数字社会学这一国际社会学界的最新研究转向进行了引介。首先回顾了数字社会学的产生背景, 通过理论溯源认为数字社会学应当被视为一种学科大融通的尝试与努力。研究认为, 数字社会学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前数字”时代传统技术社会学的继承和发展。最后, 本文认为数字社会学的主要研究主题包括大数据的获取与分析、数字媒体使用的社会学分析以及数字社会学批判性研究。

关键词: 数字社会学; 数字化; 互联网; 大数据; 数字媒体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数字社会学(Digital Sociology)是国际社会学研究领域新诞生的一个分支学科^①, 目前已经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尤其是一系列的学术专著, 这些著作试图界定这一新兴社会学研究模式的主要主题、研究方法和学科边界, 尝试为理解技术和社会的新发展给出解释性的框架^[1-6]。然而, 国内社会学界对于数字社会学鲜有涉及, 几近空白, 基于此, 本文尝试对数字社会学进行引介, 着重回答四个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数字社会学? 什么是数字社会学? 数字社会学与其他近似分支学科(如技术社会学、网络社会学等)有什么关系? 数字社会学包含哪些重要的研究主题?

一、数字社会学的产生背景

(一) 数字社会的出现

早在 1995 年, 尼葛洛庞帝就已预见, 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构建的现代社会中, 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将呈现出全新的面貌, 概言之即数字化^[7]。20 多年后的今天, 世界已然进入了网络时代(或信息化时代), 抑或用最近在社会科学界流行的一个词来形容, 即数字化时代。毋庸置疑,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充斥着个人数字设备的世界。根据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统计, 截至 2021 年, 全球网民数量达 49 亿, 网络的全球渗透率已达 63%; 全球每 100 人拥有手机 114 部, 其中每 100 人中活跃手机宽带用户数为 90 人^[8]。而据第 48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 2021 年, 我国网民规模为 10.32 亿, 其中手机网民数量达 10.29 亿, 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99.7%^[9]。虽然网络接入的方式和使用方面存在国别、区域和人群差异, 但上网无疑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通(而非特殊)元素。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通过各种终端接入互联网。然而, 所有个人活动都会留下数字痕迹, 而这些数字痕迹可以被汇编成个人或群体行为的综合画

^① Digital 也被译为数码(的), 但在狭义上“数码”一词通常被用于指称消费类电子产品(如数码相机、摄像机、扫描仪), 为避免语义歧义, 本文将 Digital Sociology 译为“数字社会学”而非“数码社会学”。

像，这将极大地改变我们对生活、组织和社会的理解^[10]。

数字化的核心特点是可以使信息比特化^①。比特不同于原子，它通过网络进行传输，不依赖于现实物理空间，同时更为关键的是比特可以计算。在《数字化生存》中文版的封面上印着这样一句话——“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11]，当时许多人可能无法真正理解这句话，但20多年过去了，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发展，各种各样的算法正在改变着人类生活，现在再看这句话显得意味深长。进而，世界的数字化将导致人与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数据化，有学者甚至指出，基于云计算与大数据的发展，人类在大气层和生物圈之上正在构建一个心智层（noosphere），即世界上所有的可由数据沟通的信息、知识、心智和思想组成的新维度^[12]。

（二）数字社会学的出现

可以认为，社会科学的核心使命是研究现代性问题。自工业革命以降，生产性力量不断迭代更新，理性化氛围越来越浓郁地笼罩着全社会，那么当前这种新型的“数字社会”与这些过程存在什么关系？人类活动正通过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设备（有意或无意地）被记录和连接，这是否预示着技术社会发展的新逻辑，抑或是社会的持续理性化？随着信息生产和交换的速度不断加快，是否会催生新的社会关系？为了解答上述这些问题，有效感知和理解这个信息极速涌流、联系无远弗届的新时代，我们亟需一门学科用以解释当前大多数人所处的网络化、数字化的社会，而“社会学作为一门活的、不断进化的学科也在不断地寻找新的议题”^[13]，因此，数字社会学的出现显得非常应时应景，而且，社会学最富有成效的时刻往往就发生在该学科拥抱不确定性并将其转化为优势的时候^[14]。不难发现，如果从这一前瞻性的视角出发，“数字”必将成为社会学家们欣然接纳的研究素材。

当然，对数字社会学的需求并不仅仅停留在当前的这些生活数字化趋势上。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我们正在逐步超越当前的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和信息网站的时代。比如，我们期待已久的物联网（IoT）已经开始落地成形，连接网络的传感器、处理器正被嵌入到日常物品中（如冰箱、空调、衣服）。更有甚者，现实版“钢铁侠”马斯克表示，其成立的脑机接口研究公司准备进行人体脑机接口实验，通过往人脑中植入无线连接的电子芯片，让人脑信息与电子设备信息之间产生交互^[15]。可以想见，随着“物理空间”与“代码空间”的相互叠加，“智能”物体接收和处理数据的能力似乎将大大改变人们与物质世界的关系。

二、数字社会学的界定及溯源

（一）数字社会学的界定

究竟什么是数字社会学？遗憾的是，目前学界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必须承认，数字社会学既不是一个特定的社会学理论流派，也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研究方法。在一般意义上，可以认为，作为社会学的一个最新分支，数字社会学主要聚焦作为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数

^① 比特是二进制数（Binary digit, BIT）的音译，是信息量的最小度量单位。

字媒体,试图理解当前各种不同的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如何影响人类的行为模式,以及如何促进社会关系和自我概念的重构^①。经细致检索,以“数字社会学”作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最早出现于2009年,美国社会学者韦恩反思了媒体和数字技术如何影响社会学研究和教学^[16];2013年,第一本以“数字社会学”为主题的纯学术著作面世^[2];2015年,卢普顿出版了第一本“数字社会学”独著^[3];同年2月底,美国东部社会学会的学术年会在纽约召开,年会期间举办了首届“数字社会学”专题研讨会^②。至此,数字社会学开始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门话题。

事实上,虽然“数字社会学”这个概念还没有完全进入大众视野,但社会学家们在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兴起之初就已经开始从事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探讨了有关网络空间、网络社区和网络身份等社会问题。类似研究被冠以许多不同的概念,如“网络社会学”、“互联网社会学”、“网络社区社会学”、“社会媒体社会学”、“网络文化社会学”等。与这些概念不同的是,数字社会学的涉猎范围更广,不仅涉及互联网或网络文化,还涉及本世纪以来出现的其他数字媒体和媒介。诚然,概念是具有实体性意义的聚集,而且这种意义有特定的语境和目的,因此某个概念即便在不同时期一直在被使用,但其含义可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概念的变化意味着对社会认知的深化,正如概念史研究的创始人考泽莱克所言,“概念是社会的显示器,同时也是社会的推动器”^[17]。因此,随着互联网越来越普及,数字媒介越来越发达,信息的生产和传递越来越便捷,日常生活日益被数字化,社会科学中的“网络”、“信息”等概念似乎在悄无声息间已经被“数字”所取代。

此外,当我们试图谈论数字社会学时,不难发现,数字社会学与数字人文、数字人类学、计算社会科学以及新计算社会学等相关新兴分支学科之间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不过,可以认为,数字社会学在其中可能最具“雄心壮志”,它不仅接纳了传统的网络研究,也在尝试整合前述近似分支学科,并将最新的Web 2.0数字技术(如可穿戴技术、AR技术、物联网和大数据技术)纳入其研究范围。在此意义上,数字社会学应当被视为一种学科大融通的尝试与努力,试图跨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边界。

(二) 数字社会学的前身

需要指出,数字社会学并不是社会学学科第一次将注意力转向技术。事实上,技术一直是社会学关注的焦点,19世纪后期社会学的出现正是为了应对与“新”技术发展纠缠在一起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因此,值得留心的是“社会学的先辈们对技术的强烈而持续的兴趣”^[18],虽然这些先辈们可能并不关注“数字”技术本身。可以说,数字社会学延续了悠久的历史技术社会学的思想。

在古典社会学时期,许多早期的社会学思想家都对技术(更准确地说对“机器”)有话要说。例如,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对人类理智发展历程的描述,正是由他对最后的技术主义

^① 参考自维基百科“数字社会学”词条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igital_sociology。

^② 详见 <https://digsoc.commonsgc.cuny.edu/conference-papers-2015>, 相关会议论文由丹尼尔等人主编并于2017年正式结集出版^[4]。

“实证阶段”的重视所驱动^[19]。与孔德不同的是，韦伯对他那个时代的这些技术创新体现了一种深深的矛盾心理，他提醒世人要特别关注由于技术发展而不得不进行妥协的社会条件^[20]。当然，探讨技术问题最具代表性的古典社会学家无疑是马克思。马克思给社会学留下了一个持久的遗产，即要以双刃剑的方式来看待技术。一方面，他的许多著作都指出了机器如何使资本对工人的统治和剥削得以实现，正如马尔库塞所指出的，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敏锐地说明了统治是如何通过技术并作为技术而延续的^[21]。另一方面，马克思也保留了一种希望，即社会也许能够以其他更人道的方式利用这些技术——通过释放技术潜力，为取代工资制度和建立真正的社会生产体系提供机会^[22]。

进入 20 世纪之后，随着社会学的发展，许多社会学家对技术重新进行了解读。当时最突出的一个声音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他尤为关注技术发展的文化因素。奥格本认为技术发明并不是简单地由个人天才创造出来的，相反，新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不同的发明家同时出现类似的技术突破就证明了这一事实^[23]。奥格本还探讨了技术发展的不利影响，提出了“文化堕距”的概念，即社会生活、观念和制度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适应“物质文化”的发展（特别是新技术的发明），这种社会适应性的迟滞会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虽然奥格本的理论“读起来像是对技术决定论的模仿”^[24]，但他还是承认了“社会制度和技术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关系”^[25]。可以认为，奥格本为后来的社会学家更细致地讨论技术在塑造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20 世纪还有一系列非社会学家开始探讨技术的社会影响，尤其是一些哲学家。比如，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海德格尔对技术进行了一系列追问，他认为既不是某种合乎目的的手段，也不是某种中性的东西，而是一种解蔽方式……技术参与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建构，使人与事物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变为技术的统治物^[26]；又如，解构主义哲学家利奥塔讨论了计算机时代的知识，他预见，计算机和信息处理技术正在改变着知识的性质，甚至在知识构成体系内部，任何不能转化输送的事物都将被淘汰，一切研究成果都必然转化成电脑语言^[27]。再如，在人文主义技术哲学家埃吕尔看来，“技术”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发生系统和系统逻辑，作为新的社会秩序的决定性力量，技术以牺牲“人性”和“自然界”利益为代价^[28]。埃吕尔由此提出了一个“绝望”的观点，认为技术社会将持续处于与人类自由的辩证张力（*dialectic tension*）之中^[29]。

此外，比较接近数字社会学的先驱研究可能还有跨学科领域的“科学与技术研究”（STS）。“科学与技术研究”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汇集了对参与科学、工程和技术批判感兴趣的各种学术领域，如科学史、科学哲学、人类学和公共政策。早期“科学与技术研究”的许多工作借鉴了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当时的科学争议，在此背景下，转向“科学与技术研究”的社会学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技术的探究性问题，尤其是提出了“技术建构社会”的命题，而这个命题与当前数字社会学的关注点恰好相吻合。

或许数字社会学的概念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新意，因为社会学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一直对

技术保持高度的关注。毋宁说,当前人们对数字社会学的热衷,恰好是呼应了过去 100 多年来社会学的技术“转向”。不过,虽然技术发展的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当前的数字技术浪潮之下,相比过往,技术条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已经大不相同。毕竟,无论马克思、埃吕尔等人多么有先见之明,在他们的论证中不可能考虑到今时今日的人工智能或物联网的发展。纵然是卡斯特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完成的“互联网”经典研究^[30],相比今天的网络环境也已是截然不同的命题,现在再谈论“全球网络的互联和开放潜力”已经不合时宜了。而且,数字社会学使我们能够纠正以往技术社会学研究中的具体盲点。例如,数字社会学可以更好地处理数字技术的计算基础问题,尤其是软件、平台和系统的编码架构。此外,数字社会学也提供了更好地解决与技术使用相关的亲密性、个人性和情感性问题的机会。总之,随着社会活动的数字化进程加快,数字社会学的研究可以比以前的技术社会学更加内敛和细微。

三、数字社会学的研究主题

鉴于数字技术已经充分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并且已经成为人们采集信息和维持社会联系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数字社会或数字世界理应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项核心内容。根据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概括而言,本文认为数字社会学的研究主题至少包括三个互相关联的组成部分,主要如下:

(一) 大数据的获取与分析

要利用大数据开展质性研究或定量研究抑或融合研究,重点在于大数据的收集和使用以及大数据分析工具的选择。因此,数字社会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包括:如何最有效地使用工具来存储和分析大数据?如何处理网络上不断涌现的数据信息?以及围绕这些数据使用的道德问题(如版权、隐私和数据保护问题)。目前,各种网络平台不断在收集的各种“自然”或“偶然”产生的数据(如社交平台的帖子、搜索引擎搜索记录、用户短信甚至 GPS 轨迹数据)已经逐步被用于研究分析。其实,这种从信息网站或社交媒体网站提取用户数据进行的定量社会研究被就是“网络计量学(cybermetrics)”。虽然这种方法在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等领域已经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应用,但迄今为止,社会学家使用的并不多。在社会学领域的大数据研究论文最早也最具代表性的是范德里特等人在 2013 年关于“名气”的研究。作者通过分析 2004-2009 年的 2200 种美国各类日报与周刊中个体姓名出现的次数,最终筛选出 10 万个姓名,形成了一份包含姓名及其每天出现次数的“大数据”,然后再对这些人名进行简单的分布分析与流动性分析^[31]。在国内,也有个别学者已经开始对社会学的大数据研究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例如陈云松基于谷歌图书的语料库通过检索学科关键词获得了历年的词频数据,以此对 19 世纪中期以来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进行了追踪分析^[32]。

不难发现,相比社会学传统的调查数据分析,借助网络实现的大数据分析,其优势主要体现在:第一,在大数据环境下,样本数量几近总体数量,抽样的必要性基础消失;第二,

涉及个人和群体的大数据是在现实生活中“自然”、“无感”地形成的^①，可以有效避免被调查对象的“心理二重区域”问题^②，因此大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第三，传统问卷重在数据的“搜集”，问卷的设计都极具针对性，因而问卷数据分析的应用范围受到明显限制，而大数据研究则侧重数据的“挖掘”，产生的客观数据没有针对性，仅是对真实世界的自然记录，有利于研究者充分发挥社会学想象力，研究分析没有边界^[34]。

（二）数字媒体使用的社会学分析

自互联网出现以来，许多社会学家利用数字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研究了许多不同的社会问题，如少数群体的网络自我呈现，线上活动的表达和组织，自我呈现、自我认同与网络社交模式的关系等。例如，古德与梅西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就是通过社交媒体推特（Twitter）研究了人们心情变化情况。作者通过数据挖掘技术从推特中获取了来自 82 个国家 240 万人的 5 亿条推文，然后使用文本分析软件对推特文进行内容分析，识别出包括焦虑、愤怒、抑郁等在内的 60 多种情绪，并进一步将其归纳为“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分析发现，人们一般在早上起床时拥有最好的心情、人们在周末更加快乐、情绪会随季节而变化^[35]。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社交媒体的发展呈指数级增长，并逐渐成为了人们进行社交活动的必备工具。以脸书（Facebook）为例，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络，它还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统治这一领域。数据显示，自成立以来，脸书平台的全球月活跃用户持续增加，且势头迅猛。在 2012 年 9 月，脸书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突破 10 亿用户的社交网络；2017 年 6 月全球月活跃用户数突破 20 亿；截至 2020 年第一季度，脸书的全球月活跃用户数达 26 亿，超过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36]。当前，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和设备的用户几乎覆盖了各年龄段，而且正如托夫勒预示的那样，财富革命的核心是产消合一（prosumer）^[37]，而最典型也最彻底的产消合一模式或许就存在于互联网行业——用户不仅是消费者，也是内容生产者。

事实上，面对蓬勃发展的数字媒体，尤其似乎最为普及的社交网络及其持续产生的海量资料（主要是质性资料），数字社会学研究的关键是如何研发文本资料分析工具，以便更加有效地利用文本、影音等质性资料开展社会学研究。在传统的社会学研究中，质性方法与定量方法之间一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鸿沟，但当前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融合融通在数字化时代成为了可能。正如刘易斯等人指出的那样，现代计算技术与人工方法的精心融合既可以保留传统内容分析的优势，也具有系统的严谨性和上下文的敏感性，同时还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大数据的规模能力和算法准确性^[38]。

^① 例如，当前绝大部分网站、应用程序以及 APP 都会默认将注册用户纳入“用户体验计划”、“用户服务计划”等信息反馈或数据采集系统，而且部分数据可能涉及用户隐私，然而在注册时会阅读隐私政策的用户是极少数。

^② 所谓“心理二重区域”现象是指人们的心理存在两个区域，可以对外公开的区域和不对外公开的、保守秘密的区域。当两个心理区域有重大差异甚至处于完全互相对立的状态时，人们会有意识地说法^[33]。

（三）数字社会学批判性研究

数字社会学研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是对社会学者或其他学者使用数字媒体的方式给予批判性分析,审视数字技术的使用对研究者的反向影响。例如,布洛斯指出,通过数字引文指数系统构建的“h 指数”和“影响因子”等指标是学者们面临的复杂数据组合,而且这些指标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学术单位获得资助或进行排名的主要参考依据,对于学者个人而言,这些指标也成为他们职业发展空间的关键组成部分^[39]。阿普里卡德则对社会学者开始在研究中大量使用数字数据,尤其是通过网络上的实时串流互动(如社交媒体的帖子和评论更新)产生的数据进行了批判。她认为,虽然数据对象变新变多了,但处理数据的方法往往比较陈旧,缺乏适宜性,而且学者们往往专注于方法问题,而不是以富有社会学想象力的方式来分析所收集的数字数据^[40]。

虽然迄今为止对于数字技术或数字社会的反思或批判还不多,然而,随着教育系统更广泛地将在线教学作为其认证课程的一部分,数字技术在学术工作场所发挥的作用似乎越来越重要。正如卢普顿所言,作为一门学术性学科,传统社会学在识别和批判发生在工作场所或其他社会领域的社会不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着这一精神,继续对数字技术及其对学术实践和自我的影响进行反思和批判就理当成为数字社会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1]。

四、结语

我们必须认识到,其实数字社会学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或前所未有的领域。纵观历史,社会学一直是一门社会学家对所处时代的主导技术不断提出问题和进行反思的学科。因此,数字社会学的本质是技术社会学传统的延续,虽然研究的主题可能看起来很新颖,但数字社会学的研究方式与其他社会学领域是基本一致的。当然,数字社会学显然是 21 世纪以来社会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发展。简而言之,数字社会学标志着社会学学科有机会可以自信地超越其在工业时代的研究根基,并更好地理解一个已经开始数字化转型的后工业时代。数字社会学或许是第一次由同时沉浸在同一技术体验中的同一代社会学家对当代主导技术提出的社会学议题,因为相比之下,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理论家们几乎都没有使用蒸汽机或核反应堆的第一手经验,而许多领先的数字社会学家都是来自“生而数字”的一代人^[6]。在此意义上,数字社会学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时机。它也许不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学学科面貌,但却是持续关注现代性问题、致力推进学科发展、激发数字化时代社会学想象力的一种完全必要的新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 [1] Deborah Lupton. Digital Sociology: An Introduction[M].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2012.
- [2] Kate Orton-Johnson, Nick Prior. Digital Sociology: Critical Perspectives[M]. London: Palgrave & Macmillan, 2013.
- [3] Deborah Lupton. Digital Sociology[M]. London: Routledge, 2015.
- [4] Jessie Daniels, Karen Gregory, Tressie Cottom. Digital Sociologies[M]. Bristol: Policy Press, 2017.
- [5] Noortje Marres. Digital Sociology: The Reinvention of Social Research[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 [6] Neil Selwyn. What is Digital Sociology[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9.
- [7] Nicholas Negroponte. Being Digital[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5.
- [8]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Measuring Digital Development: Facts and Figures 2020[EB/OL]. [2021-03-07].
<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Documents/facts/FactsFigures2020.pdf>.
- [9]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2-02-25].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zxbg/hlwjbg/202202/P020220318335949959545.pdf>.
- [10] David Lazer, Alex Pentland, Lada Adamic, et al. Computational Social Science[J]. Science, 2009, 323: 721-723.
- [11] 尼古拉·尼葛洛庞帝. 数字化生存[M]. 胡泳, 范海燕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6.
- [12] 段伟文. 大数据知识发现的本体论追问[J]. 哲学研究, 2015 (11): 114-119.
- [13] Evan Willis. The Sociological Ques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al Life[M].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4] David Beer. Punk Sociology[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 [15] Michael Scaturro. Elon Musk is Making Implants to Link the Brain with A Smartphone[EB/OL]. [2020-06-18]. <https://edition.cnn.com/2019/07/17/tech/elon-musk-neuralink-brain-implant>.
- [16] Jonathan Wynn. Digital Sociology: Emergent Technologies in the Field and the Classroom[J]. Sociological Forum, 2009, 24(2): 448-456.
- [17] 李宏图, 周保巍, 孙云龙, 张智, 谈丽. 概念史笔谈[J]. 史学理论研究, 2012 (1): 4-21.
- [18] Ryan Gunderson. 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before the Turn to Technology[J]. Technology in Society 2016, 47: 40-48.
- [19] Auguste Comte. 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M]. Paris: Baillière, 1877.
- [20] Terry Maley. Max Weber and the Iron Cage of Technology[J].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004, 24(1): 69-86.
- [21]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M]. London: Routledge, 1964.
- [22] Regina Roth. Marx on Technical Change in the Critical Edi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Economic Thought, 2010, 17(5): 1223-1251.
- [23] William Ogburn, Dorothy Thomas. Are Inventions Inevitable? A Note on Social Evolution[J].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37, 37(1): 83-98.
- [24] Rudi Volti. William F. Ogburn, Social Change with Respect to Culture and Original Nature[J]. Technology and Culture, 2004, 45: 396-405.
- [25] William Ogburn. Technology and Governmental Change[J]. Journal of Busin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6, 9(1): 1-13.
- [26]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M].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77.
- [27]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 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 岛子译.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1996.
- [28] Jacques Ellul.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4.
- [29] Kevin Garrison. Perpetuating the Technological Ideology[J]. Bulletin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010, 30(3): 195-204.
- [30] 曼纽尔·卡斯特. 网络社会的崛起[M]. 夏铸九, 王志弘等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 [31] Arnout van de Rijt, Eran Shor, Charles Ward, Steven Skiena. Only 15 Minutes?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Fame in Printed Media[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3, 78(2): 266-289.
- [32] 陈云松. 大数据中的百年社会学——基于百万书籍的文化影响力研究[J]. 社会科学研究, 2015 (1): 27-52.

- [33] 李强. “心理二重区域”与中国的问卷调查[J]. 社会学研究, 2000 (2): 40-44.
- [34] 罗伟, 罗教讲. 新计算社会学: 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学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5 (3): 222-241.
- [35] Scott Golder, Michael Macy. Diurnal and Seasonal Mood Vary with Work, Sleep, and Daylength Across Diverse Cultures[J]. Science, 2011, 333(6051): 1878-1881.
- [36] Jessica Clement. Number of monthly active Facebook users worldwide 2008-2020[EB/OL]. [2020-04-30].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264810/number-of-monthly-active-facebook-users-worldwide>.
- [37] 阿尔文·托夫勒, 海蒂·托夫勒. 财富的革命[M]. 吴文忠, 刘微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6.
- [38] Seth Lewis, Rodrigo Zamith, Alfred Hermida. Content Analysis in an Era of Big Data: A Hybrid Approach to Computational and Manual Methods[J].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2013, 57(1): 34-52.
- [39] Roger Burrows. Living with the H-index? Metric Assemblages in the Contemporary Academy[J].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2012, 60(2): 355-372.
- [40] Emma Uprichard. Being Stuck in (Live) Time: The Sticky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J].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2012, 60(S1): 124-138.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Sociology: A New Perspective of Social Research

Wu Bin

(School of Law,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 Zhejiang, 310018)

Abstract: Based on a careful review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in digital sociology, this paper introduces digital sociology as the latest research turn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community. Firstly,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sociology is reviewed, and through theoretical tracing, it is argued that digital sociology should be regarded as an attempt and effort of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t is argued that digital sociology is a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in the "pre-digital" era under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s. Finally, it is argued that the main research themes of digital sociology include the acquisition and analysis of big data, the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digital media use, and the critical study of digital sociology.

Keywords: digital sociology; digitalization; Internet; big data; digital media

作者简介:

吴彬(1986-), 男, 浙江丽水人, 博士,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组织社会学、数字社会学。

Email: wubin86@hdu.edu.cn

联系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下沙高教园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法学院